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

The Choice of China Growth Mode

吴敬琏 著

吴敬琏 著

The Choice of China Growth Mode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增订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吴敬琏著. —3 版(增订版).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06-856-3

I. 中… II. 吴… III. 工业经济—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915 号

责任编辑: 匡志宏
装帧设计: 张晶灵
版式设计: 李如琬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

著者: 吴敬琏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http: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3 版(增订版)第 1 次印刷

2006 年 2 月第 2 版(修订版)第 1 次印刷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76 千字

印张: 15.25 插页 4

印数: 21201—26300

ISBN 978-7-80706-856-3/F·357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594779)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目 录

1. 导论	1
1.1 写作缘起 / 3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 8	
1.2.1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 8	
1.2.2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 / 9	
1.2.3 I、II 部类的划分和轻重工业的划分 / 10	
1.2.4 服务业和三次产业的划分 / 12	
1.3 本书的结构 / 14	
2.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	17
2.1 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 21	
2.1.1 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 / 21	
2.1.2 理论概括一：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社会矛盾激化 / 22	
2.1.3 理论概括二：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 23	
专栏 2.1 从“工业化论战”到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 / 25	
2.1.4 理论概括三：从“霍夫曼定理”到“重化工业化阶段” / 29	
2.1.5 理论概括四：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 30	
2.2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 32	
2.2.1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 / 33	
2.2.2 现代经济增长 / 36	
2.2.3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看新型工业化道路 / 39	
2.3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 41	
2.3.1 “苏联现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 41	
2.3.2 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从“奇迹”到危机 / 43	
专栏 2.2 东亚金融危机 / 47	

3.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	49
3.1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 51	
3.1.1 现代技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兴起 / 52	
3.1.2 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化 / 56	
3.1.3 革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经济效率迅速提高 / 62	
专栏 3.1 通用目的技术(GPT) / 63	
3.2 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 64	
3.2.1 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 64	
专栏 3.2 金万堤论韩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 / 68	
3.2.2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 / 72	
3.2.3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够对提高效率起重大作用? / 74	
3.3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和改造各产业部门 / 77	
3.3.1 信息技术创新的三次浪潮 / 78	
专栏 3.3 硅谷为什么成为创新者栖息地? / 79	
专栏 3.4 部分国家的信息化战略 / 81	
3.3.2 计算机生产率悖论: ICT 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 / 85	
3.3.3 IT 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 / 87	
4.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93
4.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 95	
4.1.1 早期增长模式在中国影响深远 / 95	
4.1.2 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 / 97	
专栏 4.1 毛泽东论中国工业化 / 103	
4.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的探索 / 105	
4.2.1 1979 年和 1981 年的两次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 / 105	
4.2.2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除 / 106	
4.3 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的消极后果 / 110	
4.3.1 负面效应的综合表现:“扬短避长”,造成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 110	
4.3.2 负面效应的具体表现 / 115	
4.3.3 过度投资扭曲了经济结构,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 / 123	

5.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	129
5.1 出口导向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 131	
5.1.1 从进口替代全面转向出口导向 / 132	
专栏 5.1 出口导向战略 / 132	
5.1.2 出口导向政策支持了高速增长 / 137	
5.2 出口导向政策导致的问题 / 138	
5.2.1 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持续支持了粗放增长模式 / 139	
5.2.2 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持续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 140	
专栏 5.2 台湾从奇迹到危机的经历 / 141	
6.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49
6.1 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 / 151	
6.1.1 鼓励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 / 151	
6.1.2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 156	
专栏 6.1 供应链管理 / 158	
6.1.3 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 / 162	
6.1.4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 163	
6.2 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实现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 / 165	
6.2.1 以技术进步为例 / 166	
6.2.2 以发展服务业为例 / 174	
6.2.3 以信息化为例 / 176	
6.3 改革攻坚，建立健全集约增长的制度基础 / 178	
6.3.1 继续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 / 178	
6.3.2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 180	
6.3.3 注重金融体系的基本制度建设 / 180	
6.3.4 改革科学和教育体制，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 182	
6.3.5 坚持信息化与改革同行，普及应用信息通信技术 / 183	
6.4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 184	
6.4.1 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 / 184	
6.4.2 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 185	
6.4.3 建设有限和有效政府需要的配套财政改革 / 190	

附录	193
1.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2004) / 195	
2.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2005) / 203	
3.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2008) /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26
人名索引表	231
名词索引表	233
初版后记	237
修订版附记	239
增订版后记	240

导 论

-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作理论和政策研讨所得出的结果。
- 为了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和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需要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作更深入的研究。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作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

1.1 写作缘起

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2000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

自从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以后,全国许多地方提出要成为中国的“硅谷”。在20多个最有希望成为“硅谷”的中国城市中,北京的中关村由于技术人才高度密集,又可以依托北大、清华这样一些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自然成为其中的首选。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关村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开办了不少技工贸一体化的企业,归国创业的留学生数以千计,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也不乏建树。例如,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0年12月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其中有不少重要突破。但是总的看来,中关村在营建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才潜能发挥的制度环境,并进而成为我国“高新技术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基地、新型企业家的摇篮”方面的进展远远没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快。为了认清问题所在和提出改进的意见,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在2000年末邀请了一些产业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举行了两天的研讨会,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我和段永基先生就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去向北京市的领导人作汇报时,北京市的领导人反过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使市里感到很为难。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老实说,我们原来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见。我们知道,北京市领导当时待解的这一难题,后来是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发展合资的汽车制造业得到缓解

的。正如媒体所报道的,2002 年中期,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和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10 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12 月 23 日用韩国部件组装的第一批汽车开始下线。2003 年,北京现代共生产轿车 5.5 万辆,实现销售收入 87.7 亿元,利税 37.1 亿元;加上北京地区的配套企业,主要是“现代”自己的和它从韩国带来的零部件供应商,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114 亿元。就这样,北京现代用 200 天创造了北京主流传媒所说的“北京模式”和“现代奇迹”。^①这似乎也证明了快速发展重型加工工业使之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的方针的正确性。但是短期获得的巨额产值和大量利税并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北京现代直到投产两年以后,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用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汽车 KD 厂商(组装商)^②。在当前汽车工业已经高度机电一体化、轿车成本中电子产品成本占 $1/3 \sim 3/4$ ^③的情况下,如果北京要想成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轿车生产基地,而不是简单地做装配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不把中关村富集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才能,是决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次冲击发生在 2003 年在深圳市讨论它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深圳是我国重要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基地。我国在利用国内外资源开发自主技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并且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技术和中兴通信的总部也都在深圳。但我在 2003 年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时却意外地获悉,在前一段讨论深圳战略发展方向时,主流意见认为该市经济存在“结构太轻”的“重大缺陷”,需要进行“重型化”转型。当时我和几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样,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扩大辖区面积的要求,是不赞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 100 多年,到 2003 年末

① 参见陈志其:《北京现代奇迹背后的故事》,载《经济观察报》,2002 年 12 月 28 日;王亦丁:《现代汽车如何驶入中国》,载《环球企业家》杂志,2003 年 3 月。

② KD(组装)有三种主要形式:CKD 为全散件组装;SKD 为半散件组装,部分总成是现成的;DKD 则是车身大总成,装上轮子就是整车。

③ 据业内人士称,上个世纪 80 年代轿车总成本中,电子产品成本占 12%,进入 90 年代,这一比率已经提高到 30%。目前在高级轿车中,电子产品成本已占总成本的 60%~70%;在普通轿车中,也占到 30%。参见《深圳汽车电子产业加速抢跑》,载《深圳特区报》,2004 年 4 月 13 日。

已开发的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 22%^①。深圳的 GDP 只有香港的 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土地已经用完的资源硬约束^②。由于“缺乏生存空间”,某些人士提出了从邻区划入土地的要求。^③ 不过当时我对上述想法虽然深表怀疑^④,但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我国整体增长模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

2004 年初我对浙江的经济发展作了一次调查。浙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省份。据我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它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与市场有紧密联系,并且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应因而具有极强竞争力的中小企业。2004 年 4 月重访浙江,我的印象是:浙江在经历了 20 年数量扩张以后,正面临着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市场“业态”升级的严峻挑战。例如,浙江多年蝉联全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冠军,许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销量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 80%,甚至超过 90%。但是浙江的出口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大路货”,附加值很低;有些质量较好的商品,往往也是为人代工(OEM),自己只赚很少一点辛苦钱。例如浙江拥有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制造商,但这个手机制造商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全然没有自己的自主技术。如果不想受制于人,就必须下决心进行自主技术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和价值含量。与此同时,曾经在浙江产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以“三现”(现场、现货、现金)交易为主的专业市场,其“业态”也亟需升级,实现由所谓“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完全转变。总之,浙江经济亟需进行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以便在效率有明显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增长。然而,当时浙江的主流想法是:“在当前的重化工业化时代”,一向以“轻(型)、小(企业)、加(工业)”见长而“缺乏厚度”的浙江经济,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

① 《香港 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http://www.info.gov.hk/yearbook/2003/tc_chi/append/app6_31.html。

② 深圳数据来源于《深圳市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政府在线: http://www.shenzhen.gov.cn/jingji/tongji/2003yxqk/200404190207.htm;香港数据来源于《香港 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 http://www.info.gov.hk/yearbook/2003/tc_chi/append/app6_1.html#table1a。

③ 参见:《剩余土地仅够开发 10 年,“大深圳”版图扩张猜想》,载《南方都市报》,2004 年 3 月 8 日。

④ 后来《南方日报》在一篇关于深圳土地稀缺问题的报道中提到,“当深圳市领导在今年的高级顾问会上再次提出这种(扩大行政区划的)想法时,吴敬琏、高尚全等顾问就直言不现实,指出深圳的视线应向内,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见《突破土地困局》,载《南方日报》,2004 年 8 月 25 日。)

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①。这时,我对相关问题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看法,因此在我的调查报告中对我所看到的现象和向现代增长模式转型、市场的升级等问题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②。

这种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不但存在于个别省份,如同一篇传媒报道所说,当时“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③ 这些“愿望与趋势”在21世纪之初汇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流。

就像过去的历次经济过热一样,这次过度投资热潮很快就造成了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状态。在那以后,又经历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宏观调控”。

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这种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也在理论界反映出来。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了不少文章,论证重工业投资热潮的合规律性。这些文章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发展缓慢、竞争力弱的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标志之一,是重型工业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化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这给今年的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④

① 参见《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时报》2004年3月19日。

② 见本书附录1吴敬琏:《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4年第93号(总第2152号),2004年7月21日。

③ 见《重化工之争》,《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4日。

④ 参见《我省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阶段》,《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工业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新华社北京2003年11月29日电;《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商务周刊》,2004年3月2日;《我国四大重点行业投资分析》,《经济日报》,2004年6月16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更具有理论色彩。这篇报告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er G. Hoffmann)和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分别于1931年和194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论证了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①

这种非同寻常的事关我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重要理论和政策动向,自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

在2004年春节我和我的学生们聚会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那份报告的执笔者也在座。他向同学们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有别的同学认为,他的论证是不周密的:第一,“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并不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公认定理;第二,用短期间的数据,即我国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1.8%上升为2003年上半年的57.5%的短期飙升,并不能证明这是一种长期的正常趋势;第三,用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即2001年、2002年和2003年1~7月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分别比轻工业快5.71、1.68、6.25个百分点,也不能证明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教学相长”,历来如此。同学们的热烈讨论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要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需要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作更深入的研究。于是,我查阅了大量发展经济学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对照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增长模式;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就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过时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应当力求避免落入这一陷阱。而且,以重化工业投资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更是与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冲突的,因而决不可行。我就这一初步结论在

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载《经济日报》,2003年12月1日。

2004年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作了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发言,并在2004年10月的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增长模式的选择》的发言。在那以后的讨论中,我从赞成我的观点和反对我的观点的同行那里汲取营养,形成了题为《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长文^①。本书就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增补和扩展而成的。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歧义影响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我们首先对本书采用的若干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

1.2.1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虽然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经常作为同义词而混用,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已经是国际论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他的《经济学》1976年第10版一开头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近来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他们非常反对以实利主义的态度来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物品的数量。用一位年轻的激进派引人注目的话来说:‘不要向我提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为了矫正这种偏差,人们提出用经济净福利(net economic wealth,简称NEW)来取代GDP^②”。

对于发展,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有过这样的陈述:“发展代表着社会的变革,它是使各种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教育卫生问题的处理以及生产方式等变得更‘现代’的一种变革。然而变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发展带来的变化能够使个人和社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展能使个人拓宽视野、减少闭塞,从而使人生更丰富,发展能减少疾病、贫困带来的痛苦,从而不仅延长寿命,而

① 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P·萨缪尔森(1976):《经济学》(第10版),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页。

且使生命更加充满活力。根据这一发展定义,发展战略应以促进社会变革为目标,找出不利于变革的障碍以及潜在的促进变革的催化剂。”^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度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指标,但是正如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 GNP 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等等,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这些指标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但归根到底,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谋福利。“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②

在森的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定了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③,并且每年编制《人类发展报告》。

1.2.2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

为了说明苏联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虽然很高、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苏联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在这里,“方式”一词的俄文是 Тип。它也可译作“类型”。

苏联在从 1928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较之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较,苏联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程度却一直未见降低。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苏联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第 2 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的论述^④,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他们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extensive growth,或译粗放增长);

① J·斯蒂格利茨(2000):《新的发展观:战略、政策和进程》,载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年,第 148~169 页。

② A·森(1999):《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③ 人类发展指数(HDI)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成就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用以衡量各国在人类发展基本方面的成就水平。

④ 马克思那一段论述的原文是: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92 页。引号中的话在《资本论》莫斯科外文出版局 1954 年英文版中的译文是:“extensive if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is extended; intensive i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made more effective.”)

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叫做内涵增长(intensive growth,或译集约增长)。他们指出,苏联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采取了前一种增长方式,因而增长虽快,却实惠不多。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苏联领导人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确定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增长方式从外延为主到内涵为主的转变。虽然在苏联以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写进了“由外延增长方式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要求,但这种转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能实现。

现代发展经济学也经常使用增长模式(growth pattern 或 growth model)的概念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例如,日本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中采用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称为“马克思所分析的增长模式”,而把它们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普遍采用的效率驱动增长模式称为“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分析的增长模式”^①。

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增长模式概念与苏联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增长方式概念大体上是等值的。正像科尔奈(Janos Kornai)所说,可以把生产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要素投入增加对增产的效应;另一类是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增产的效应。“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用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种术语,即‘外延方式’和‘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用语在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于外延方式,要素生产率提高则等于内涵方式。”^②

不过仔细想来,二者论述的角度还是有所不同。苏联经济学家主要从结果的角度,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则主要从原因的角度使用这一词语。本书也在这种意义上分别使用“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这两种说法。

1.2.3 I、II部类的划分和轻重工业的划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讨论再生产问题时,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其中,第I部类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第II部类从事消费品的生产。霍夫曼在讨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生产结构变化时,作了与马克思相

①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 J·科尔奈(1992):《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1~178页。